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来源集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54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研究基地

主办

“文明互鉴与文学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文明互鉴与文化多样性

- 1 比较文学的前沿问题与“学术川军”的全球视野 曾艳兵
12 面对三星堆的失语
——四重证据法重建思想史原点 叶舒宪
24 曹顺庆对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
——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
论体系初探》为中心 李伟昉
32 文明互鉴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思考 曾 明 常华仁 程宏伟
43 试论天府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杨玉华 罗 静
60 世界文论的“融通性互补”与“世界诗性”:
基于跨文化诗性阐释的视角 张宏辉 郑春兰
78 文明互鉴:文化差异与东方文化的独特价值 张 峰

文明互鉴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 91 审美心智活动与艺术创造性思维过程的认知阐释
——《文心雕龙》“思表纤旨”与认知诗学
“具身心智”的比较研究 支 宇 周倬屹
104 融通与变异:《文心雕龙》关键词“神思”英译与
阐释 刘 颖
115 方法论视域下的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研究 孙 太
127 从审美视角看《道德经》中的“道”与《摩诃
婆罗多》中的“梵” 王 涛
137 早期“笑”的重构
——英语世界老舍作品“喜剧论”研究辨析 续 静

文明互鉴与中西对话

- 147 从非洲文学看西方理论视角的阐释霸权
——以《美好的人尚未诞生》为个案 邹 涛
- 162 奥斯卡·王尔德眼里的中国：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 蒋 婧 李成坚
- 178 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学的对话自我 韩周琨
- 190 荣格文论中的中国材料阐释：理路、变异和价值 喻宛婷

东方文化与文明互鉴

- 217 文学的他国化：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蛇性之淫》 寇淑婷 林天娇
- 227 文化过滤与汉学家浦安迪笔下诸葛亮形象的变异 王鹏飞 张露盈
- 240 《西游记》在新疆的多语种译介与传播：新时代
“文化润疆”示范 凯沙尔·夏木西 阿布都外力·克热木
- 253 韩中现当代文学交流研究
——朴宰雨教授访谈录 张 叉 朴宰雨
- 267 跨文明变异视域下的古代诗话元范畴术语英译与阐释 欧 婧
- 279 中国—丹麦“纸的对话”：非遗展陈中的技艺交流与
文化变异 吴光芬

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

- 289 变异学视角下近现代山水画发展的策略研究 李嘉璐
- 300 变异的诗神：亨利·哈特中诗英译考论 时 光
- 330 变异传播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刘阿平

符号学、叙事学与意义伦理

- 340 论艺术符号的出场
——并就教于赵奎英教授 唐小林 付 宇
- 350 从“象”到“相”：西汉长安城布局的堪輿符号思想
解析 叶 进
- 367 标出性翻转：20 世纪音乐风格演进的内在文化动力 张兆麟

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学

- 382 历史述源与诗性叙事
——彝族创世史诗《查姆》的诗学意义 罗庆春 吉洛打则
- 395 多维“三角”与“流动”之疆：西南研究的范式对话 赵 靛
- 407 黑色的未来图景与历史源流的榫卯
——《新星》中德拉尼的非洲未来主义 聂 韬 左茂江

生态文学与生态文艺理论

- 426 简论《沙乡年鉴》和《狼图腾》中的狼书写及其
环境伦理建构：跨文明生态对话与互鉴 胡志红
- 448 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媒介呈现
——基于中西主流媒体的比较研究 胡滢滢 纪 莉

数智传媒与文化创意

- 461 科幻成都：穿越文学的数智未来
——聚焦一场落地成都的人工智能美术展 徐新建 郭天真

- 475 文明互鉴下的博物馆特色话语构建：理论与方法
谢梅 张莹 王辰康
- 489 数字时代的诗歌游戏
郭郁烈 张曦萍
- 501 21 世纪英美学界歌剧数字化研究
庄文静

会议综述

- 514 文明互鉴与比较文学研究新格局
——“文明互鉴与文学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综述
赵渭绒 谭茹月

方法论视域下的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研究

孙 太

摘 要：若以方法论视域观之，宇文所安的唐诗史著述呈现出多元化的书写维度和属性，如立足文本细读的唐诗史书写、基于互文性的唐诗史书写、以西释中的唐诗史书写、文学化的唐诗史书写等。稽考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之方法论，对于国内的重写文学史及其话语建构，以及近年出现的方法论热，或有“异域之镜”的作用。

关键词：宇文所安 唐诗史 文本细读 互文性 以西释中
文学化书写

迄今为止，国内对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方法论的研究不多，仅有两篇文章与之直接相关，即葛红的《宇文所安唐诗史方法论研究》与陈引驰的《诗史的构筑与方法论自觉——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启示》，但二者都有概述片面、语焉不详等遗憾。相关研究在国外更是乏善可陈，仅有个别学者在书评中偶尔提及。故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对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方法论的研究都还有拓展和挖掘的空间。

唐诗史是宇文所安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他为此撰写了《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三部专史。《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也是“具有文学史性质”^①的著述，要考察宇文所安的中唐诗史书写，将二书合而观之，无疑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宇文所安还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以及该书第四章《文化唐朝》的执笔人。在海外唐诗史书写领域，宇文所安无疑是数量最多、成果最丰的学者。

^①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导论”第1页。

若以方法论视域观之,宇文所安的唐诗史著述呈现出多元化的书写维度和属性,如立足文本细读的唐诗史书写、基于互文性的唐诗史书写、以西释中的唐诗史书写、文学化的唐诗史书写等。考证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之方法论,对于重写文学史热潮及其话语建构,或有他山之璞石、异域之镜像的作用。而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在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与局限,无疑也有警示的意义。

一、立足文本细读的唐诗史书写

作为学术名词之“文本细读”肇始于英美新批评,作为学术实践之文本细读法则自古有之,如在“韦编三绝”“皓首穷经”等古代成语和典故背后,其实就暗含文本细读的方法和实践。“有人总是简单地把文本细读跟‘新批评’等同起来,不是的,所有的深入阅读都是文本细读……是一种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阅读方式。”^①宇文所安所言可谓灼见。

文本细读是宇文所安建构唐诗史的主要方法,在他的唐诗史书写里占据首要位置。宇文所安并不掩饰他对文本细读的青睐和偏爱:“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无论我对一个文本所作的议论是好是坏,读者至少可以读到文本,引起对文本的注意。”^②

文本细读是宇文所安对作品作为文学史书写主体的回归,也是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文学史必须是文学的,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回到作品本身,让文本直面读者,让文本自己说话,“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③。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完整引用并细读的诗歌文本超过200首;《盛唐诗》悉数引用并阐释的诗作接近200首;《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用于文本分析的完整诗篇超过150首,《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则将近50首;《晚唐》全文引用并细读的诗篇最多,近400首。显而易见,文本中心和文本细读是宇文所安唐诗史建构和书写的主要模式。

宇文所安文本细读法的案例很多,可谓俯拾即是。如骆宾王的《晚泊江镇》用典较多,无论对于英美读者还是中国读者而言,基于文本细读的释义

① 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第64页。

②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③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序言”第2页。

都是必不可少的。下引文字是宇文所安对该诗后八句的解读：

独自漂泊他乡，犹如风中蓬草。每睹异乡之物，顿生思乡之情，心有戚戚焉。橘生淮南为橘，移至淮北为枳；余当如橘，持志不易。不能重返瀟陵兮，心向往之。不能回归长安兮，泪洒南国。《易经》有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或可挪移身影，仿鸿鹄展翼，飞回梦里桑梓。功名于我何用？勿如效蚁丘之隐，逃舍以避孔丘。归隐之心或切，弃世之志亦坚，终不敌京城之招引，红尘之呼唤。遥望帝京不见兮，浮云蔽我目；皇恩浩荡难酬兮，谗人挡我道；宏愿如同白云兮，终归于虚幻。^①

在解读韩愈《南山诗》时，宇文所安不吝笔墨，竟用了8页的篇幅，对其进行逐行逐字的文本阐释和意义发明。在细读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时，宇文所安所用篇幅更是长达15页，其中不乏新见和洞见：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对自然循环的哲思、罕见的人性深度。^②在《晚唐》里，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更为突出，尤以对李商隐朦胧诗的文本分析最见功力。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无需一一列举。

在海外汉学界唐诗史研究领域，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功夫堪称独步。“一首诗的真正读者”，在宇文所安看来，“必须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栖居其间”^③。所谓栖居文本的特殊方法，乃是立足文本细读，走近文本，进入文本，深入文本，与文本对话，聆听文本的声音，成为文本的知音，发掘内在于文本的微言与奥义。

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表明，没有对文本的细读、精读和深研，没有文本细读的支持，要做出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撰写出个性化的文学史，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时应该看到，浅尝辄止的文本阅读无疑是不可取的，必然会闹出郢书燕说的笑话。更有甚者，若避开文本细读，拾他人之牙慧，则会沦为学术研究的二道贩子，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必然千人一面，成为单一化、脸谱化的文学史叙事。

但宇文所安或有过分倚重文本细读构建唐诗史的问题，在唐诗史书写的史学层面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他以文学作品的内在元素而非外部元素作为唐诗史书写的基础，采取以诗带史的叙事策略，在文本细读与历史维度

①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42. 引文为笔者译。

② 斯蒂芬·欧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田欣欣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1—45页。

③ 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序”第1—2页。

之间未能求得平衡,导致文本误读、历史讹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在《初唐诗》关于宋之问的专章里,宇文所安将《渡汉江》解读为一首普通的乡愁诗,就是明显的误读。史载宋之问媚附张易之兄弟,不仅为其代笔赋诗,还为其捧“溺器”。^①张易之落败,宋之问被贬迁泷州,即今天广东罗定市,不久逃回洛阳,隐藏于张仲之家里。《渡汉江》记录了宋之问仓皇北归、惧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心理,是一个畏罪潜逃者的心理写照,而不是宇文所安所说的游子还乡的离愁别绪。

这样的误读并非个例,如在《晚唐》有关李商隐的章节里,宇文所安认为《夜雨寄北》的北人乃是梓州官妓张懿仙,此说或可存疑:“李商隐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指示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一位著名歌妓。”^②引文中提到的那封信及其名句乃是李商隐写给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③梓州即今天的三台县,巴山乃缙云山的曾用名。梓州不在巴山之北,而在巴山之西,故张懿仙与《夜雨寄北》之北人实不相符。

宇文所安的误读告诫人们,光有文本细读是不够的,文本细读必须与史料考据有机结合,才能书写出中国文学的信史。宇文所安重文本而轻历史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柯保罗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初唐诗》更像一本诗歌选集,对初唐诗史的叙述明显不足,缺乏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④此类现象在《盛唐诗》也是存在的,如林理彰指出,宇文所安过分重视和依赖文本分析,对盛唐诗歌的社会历史背景叙述明显不够。^⑤

得益于国内学者傅璇琮等人的唐诗史料研究,史料讹误和文本误读问题在宇文所安后来的唐诗史书写中有所减少。即便如此,以诗带史、重文轻史现象仍是宇文所安在中唐诗史和晚唐诗史书写中的主要问题。

文学史必须是文学的,也必须是历史的,重文而轻史和重史而轻文均不可取,理想的文学史书写应该文史并重。

①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高占祥编,《二十五史》,线装书局,2007年,第953页。

② 宇文所安:《晚唐》,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44页。

③ 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董皓等编,《全唐文》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598页。

④ Paul W. Kroll, "Book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Vol. 1, p. 121.

⑤ Richard John Lynn, "Book Review of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Pacific Affairs*, 1982, Vol. 55, p. 287.

二、基于互文性的唐诗史书写

作为学术名词的“互文性”滥觞于克里斯蒂娃，作为研究方法和实践的互文性则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互文修辞术，正如赵渭绒所指出的，与互文性虽有相通之处，但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① 克里斯蒂娃关注的是文本之间的共性，认为一切文本都是对过去或当下文本的“吸收和改编”^②。

宇文所安不仅受到克里斯蒂娃的影响，也受到其授业恩师的启发：“傅汉思是中国早期诗歌研究的一个开创性人物……从他那里，我学到把诗歌视为一个共享的行为，而不是个体诗人的‘创作’的集合。”^③ 互文性注重跨文本的文学解读和研究，是对新批评文本自足的某种背反，同时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互文性视域里，文学作品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关联的文本家族。

在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建构里，互文性书写扮演的角色与文本细读同等重要。互文性有助于打通古今文本的关系，重现古今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若以互文性视域观之，唐太宗的《帝京篇》似乎开启了一系列“歌颂长安的诗”^④，其后来者包括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这一传统还可远溯至汉代的京都赋和鲍照的《芜城赋》。在《临高台》《长安古意》《帝京篇》等长诗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合并了汉赋的宏大叙事和鲍照赋的历史主题，将京城的盛与衰并置以形成一种警告：“人类社会变幻无常，只有节制才能保持长久。”^⑤

在对杜甫的《月夜》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宇文所安发现，该诗既模仿了古代的仙女叙事，也改写了当朝诗人王维的诗。杜诗与古今文学的互文性不言而喻：

杜妻被赋予传统“淑女”之属性：肤白如玉，云鬓袅袅，香气袭人。此类特质常见于后妃、宫女、传统乐府诗之美人书写，用之人妻乃属首次……诗人遥寄相思，料想他人应如是，如王维忆山东兄弟之四行名句，

① 赵渭绒：《中西“互文”辨析》，《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282页。

②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p. 36. 引文为笔者所译。

③ 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序言”第11页。

④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⑤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2页。

亦复现于杜诗。^①

宇文所安还以苦吟诗学和技巧诗学为视点,对中唐诗人孟郊、李贺、贾岛进行互文性研究。对于孟郊来说,苦吟是对于生命之苦的悲歌,而在李贺、贾岛那里,苦吟则是作诗过程的况味和喟叹。在作诗技法上,李贺和贾岛二人也极为相似:李贺将偶得散句串联成一首诗,贾岛将偶得一联佳句扩展为一首诗。

宇文所安还以互文性视角关注白居易的闲适诗,指出白居易不仅反复描写了同样的题材,还多次重复了同样的主题。白居易不惮其烦的自我互文和反复流露出的沾沾自喜,在宇文所安看来,是时人和后人评价白诗时出现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书写晚唐诗史时,宇文所安的互文性解读尤其值得称道,如登楼诗文本家族、苏小小题材文本家族、西塞山怀古文本家族、雁门太守行文本家族等。以下仅以登楼诗为例,管窥宇文所安如何在互文性解读的语境里,将晚唐登楼诗与初唐、盛唐、中唐登楼诗悉数纳入其晚唐诗史的叙事框架里。

登楼诗文本家族中较早的一篇,在宇文所安看来,无疑是初唐王勃的《滕王阁诗》,该诗前后两韵,包括“尤”韵。盛唐崔颢袭用王勃的“尤”韵,写出了叹为观止的《黄鹤楼》。史载李白登楼偶见崔诗,自叹无法超越,遂无诗而去。李白后来创作了《登金陵凤凰台》,韵脚与王勃、崔颢诗别无二致,文本的互文性不言自明。

宇文所安指出,登楼诗文本家族一直延续着,如王昌龄的《万岁楼》、张继的《秋日道中》、韩翃的《同题仙游观》、许浑的《咸阳城西楼晚眺》、韦庄的《咸阳怀古》、刘沧的《题秦女楼》、李群玉的《江楼闲望怀关中亲故》等,这些都是七言怀古律诗,都有同样的韵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或是一个例外,这是一首五言诗,但无疑同属于登楼诗家族,而且也是押的“尤”韵。晚唐李商隐登上安定城楼,依循怀古七言律诗传统,采用预设的诗歌形式和韵律,创作了《安定城楼》,为这一文本家族增添了新的诗篇。

较之文本细读法,互文性解读法赋予宇文所安更加宏阔的视域,以及更为富赡的文学史发现。一个个文本家族被宇文所安汇聚在一起进行互文性研读,如李贺、张祜、温庭筠等人的苏小小题材诗,李贺、张祜、庄南杰等人的《雁门太守行》等。宇文所安的互文解读功夫受到余宝琳的赞赏,称他是诗歌文本的“超级解读者”,是诗歌文本的忠实听众,他“倾听”诗歌文本之

^① 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00.

间的对话，并把这种对话传达给他的读者。^①

但立足互文性的唐诗史书写法，一如基于文本细读的唐诗史叙史法，也存在先天不足，即难以处理文本家族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平衡关系。刘若愚曾提出质疑，认为宇文所安以互文性为基点将文学史视为后来作家对文学前辈的顺应或叛逆，这种叙史模式不仅失之简单，历史与文本的关系也不够清晰。^②

此外，基于互文性的文学史书写法，亦如文本细读法一样，若用于断代史的书写，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但若用于文学通史的书写，其有效性似乎会大打折扣。断代史覆盖的时间跨度有限，涵盖的文人数量不多，故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文本细读和互文性解读。文学通史则不然，所涉文学历史漫长，文人数量众多，既要注重一以贯之的文学历史叙事，又须面面俱到地兼顾大小文人，实际上很难有多余的空间和篇幅让位于文本之细读和互文性之解读。

在宇文所安的唐诗断代史和中国文学通史叙事中，这一矛盾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通史的主编，在其执笔的《文化唐朝》一章里，宇文所安征引的诗篇不过二十多首，与《初唐诗》《盛唐诗》《晚唐》等动辄数百首诗的征引量相比，《文化唐朝》之文本细读和互文性解读可谓少之又少。

三、以西释中的唐诗史书写

以西释中实际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较之文本细读法和互文性解读法，以西释中的视域无疑更为宏大而开阔，往往带给宇文所安他山之石的启示和异域之镜的发现。

在《韩愈和孟郊的诗歌》里，宇文所安直陈他运用的是西方的阐释技巧，采取的是以西释中的叙史策略，即“用西方的阐释技巧解释中国诗歌”^③。在《初唐诗》开头，宇文所安重申他的视角是西方的，是中国学术传统之外的外围视角和边缘视角：“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

① Pauline Yu, “Book Review of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0, Vol. 49, p. 130.

② James J. Y. Liu, “Book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8, Vol. 38, p. 168.

③ 斯蒂芬·欧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田欣欣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7页。

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①在《盛唐诗》里,宇文所安将杜甫比作莎士比亚:“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②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书名里“中世纪”三个字本身就暗含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框架:“中世纪这一称谓……要求读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历史阶段。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東西。”^③在《晚唐》里,宇文所安坦言,他的西方视角有助于他发现中国同行不能发现的东西:“本书与中国学者所完成的工作有着基本的区别。虽然这些区别无疑地将会被归因于‘西方’观点。”^④

宇文所安的《迷楼》是以西释中方法的精彩操演:“这部书来源于我对比较文学现状进行的长期思考,特别是针对在比较语境里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建构比较的范畴。”^⑤宇文所安将英诗《牧羊人致所爱》与汉诗《陌上桑》进行了跨文化的文学解读:马洛的牧羊人和乐府诗中的使君都是引诱者,意欲招引牧羊女和采桑女,但都遭到了拒绝和戏弄。

中外文学里的引诱者通常是男性,但宇文所安强调,《青青河畔草》或是少有的例外。诗中的引诱者是一位独守空房的少妇,她以自己的声音和姿色招引了途经此地的路人。路人因担心房中有他人存在而有所迟疑,女子告知路人她的丈夫久出未归,打消了路人的疑虑,也为自己意欲出墙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在女子与路人的招引游戏中,“男人的欲望与女人的欲望相遇;但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招引被压制、被置换于诗的表面之下,变成了随后的一片沉默”^⑥。

宇文所安以西释中的唐诗史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实现了中西文学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穿梭于英汉两种语言,面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宇文所安关于唐诗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暗含了比较文学的视域、方法和属性。

①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致中国读者”第1页。

②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9页。

③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前言”第1-2页。

④ 宇文所安:《晚唐》,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导言:致读者”第12页。

⑤ 宇文所安:《迷楼》,程章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序”第3页。

⑥ 宇文所安:《迷楼》,程章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页。

宇文所安频频出入于中外诗歌文本，故他的唐诗史书写以视野宏阔、学识博赡而见称。用傅璇琮先生的话讲，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①。

但宇文所安以西释中的唐诗史书写也有其局限性，如频繁使用西方学术概念等，既有西方中心主义和学术话语霸权之嫌，也是对中国文学主体性和文学精神的某种偏离。宇文所安的解释是，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在中外两种文学史书写传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抵牾和张力。将中国文学史写给英语读者看，是用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和学术话语，还是用西方文论术语和学术话语，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若袭用中国术语和话语，英语读者可能会看不懂，若换作西方术语和话语，中国文学的精神又难以传递。

宇文所安所言不无道理，但这个道理不是绝对的。在书写中国文学史时，如何尊重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平衡本土和欧洲两种文学史书写传统，兼顾中西文论术语和学术话语，做到中西互释互证，凡此种种，不仅是宇文所安的问题，也是有待海内外学者进一步探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整合海外汉学资源的同时，不可忘记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话语，不可盲目地以西释中而不自知，否则就会导致国内学界的进一步失语，出现曹顺庆先生所说的多重失语症问题。^② 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工程里，只有中与西结合，汉学与国学并重，异域视角与本土视角共享，他山之石与本土之石互为借鉴，才有可能促进书写方法的创新，避免同质化、陈套化的文学史叙事。重写的文学史不该是重复的文学史，重写的文学史不该是失语的文学史。

四、文学化的唐诗史书写

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化就是以文学语言论文学，以文学形式论文学。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文学性的，因其观点的新颖和行文的优美而值得一读再读。

宇文所安文笔娴熟，语言自然流畅，毫无生涩呆滞之感。读者在领略宇文所安学术思想的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从下引关于《登幽州台歌》的文字片段可以看出，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写作风格闲适而雅致，有较强的节制感和节奏感：

①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傅璇琮“序”第2页。

②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

后人记住陈子昂，主要是由于这些朴素的诗句……他处于空间和时
间之中，与过去和未来相脱离，在巨大无垠的宇宙面前显得十分渺
小……所有人在永恒无垠的宇宙和时空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
渺小、短暂、微不足道……这首诗具有自然直率的美和忧伤。^①

下引片段不仅可以见出宇文所安语言的优美和叙述的典雅，也能看出作
者情感的温度。对于杜甫、李龟年的流离失所和有家难回，对于安史之乱造
成的巨大苦难，宇文所安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感慨：

这首诗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位游子终于认识到，他再
也回不了家乡，回不了京城……在江南宴游者眼里，李龟年就是杜甫所
说的“余物”……四周笼罩着开元时代的幽灵，一个恣纵耽乐、对即将降
临的灾难懵然无知的时代。^②

宇文所安不仅注重唐诗史书写的文学化，还在多个场合谈及这一话题，
如在《初唐诗》开篇，宇文所安强调，有必要脱离呆板的学术程式、审视惯
例、陈套叙事等，确保文学史写作及其阅读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经历。^③ 唐诗史
写作的文学化，在宇文所安看来，就是把思想和学术融在一起，注重语言表
述，“写出优美的文章”^④。

文学史书写的文学化不仅是以文学语言论文学，也指以文学形式论文学，
把关于文学史的思想融入文学的形式里：“作者面临的挑战是把思想纳入文学
的形式，使二者合而为一。”^⑤ 宇文所安以文学形式论文学的例子很多，如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兼具学术性、思辨性和文学
性，是一部近乎文学散文的中唐文学史论集。《追忆》因兼顾书写的思想性和
文学性，读起来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
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这一‘成功’很有意思，因为《追忆》可以说
代表着在一种英语文学形式里对中式文学价值的再创造。”^⑥

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化有助于学术的普及化，文学史著作如果味同嚼蜡而
无人问津，那就只能束之高阁。在《他山的石头记》开头，宇文所安写道：

①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5页。

② 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页。

③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致中国读者”第2页。

④ 钱锡生、季进：《探寻中国文学的迷楼——宇文所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第65页。

⑤ 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前言”第1页。

⑥ 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前言”第1页。

与其说它们是“论文”，不如说它们是“散文”。“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①

从上引文字不难看出，宇文所安对文学史写作文学化情有独钟，他的文学化的唐诗史书写是集思想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总之，宇文所安是兼具语言禀赋、文学天赋和思想家气质的文学史家。《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晚唐》是以文学语言论文学、以文学形式论文学的典范之作。正如郑学勤所言，“他把文学史当文学作品来写……笔调细腻，语言华美”^②。

但宇文所安为了思想可以自由流淌于笔下，为了唐诗史叙事的文学化和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乃至牺牲了学术写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如在《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初唐诗》《追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他山的石头记》《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著述里，都存在征引不够规范的问题，而参考文献则完全付之阙如。这些问题已为学界所诟病，如林理彰^③、柯保罗^④、倪豪仕等^⑤，都曾撰文指出这一缺憾。

在文学史书写中，写作的思想性、文学性和学术规范性并非鱼和熊掌的关系，并非宇文所安所说的不可兼得，而是可以得兼的。

结 语

文本细读、互文性解读、以西释中和文学化叙事是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重要而多元的方法论，每一种书写方法既有各自的好处，也有先天的不足，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而更多的时候，它们为宇文所安所统摄和整合，成为熔于一炉、浑然一体的文学史书写方法和叙事策略。宇文所安的多卷本唐诗史著述富于新见和洞见，它们是方法论层面别具一格的文学史，对于国

①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自序”第1—2页。

② 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译后记”第165页。

③ Richard John Lynn, “Book Review of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Pacific Affairs*, 1982, Vol. 55, p. 286.

④ Paul W. Kroll, “Book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Vol. 1, p. 127.

⑤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Book Review of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98, Vol. 58, p. 288.

内学者不无参考价值。同时，宇文所安的文本误读、史料讹误、以诗带史、重文轻史、西方中心、欧美话语等，也同样值得国内同仁警醒。

作者简介：

孙太，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证书编号: 222930S2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收录证书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中外文化与文论》** 入选为CSSCI
(2023-2024) 收录集刊，特发此证，以资证明！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中国社会科学
评价中心
2023年6月

